

社會資本及幸福感相關性之 跨國與跨年齡層比較

王友惠* 翁慧卿**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生
E-mail: u19920913@gmail.com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研究所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hc6127@mail.ncku.edu.tw

收稿日期：2016.05.25；接受刊登：2016.12.05

本研究以跨國資料探討在不同年齡層中社會資本對幸福感的影響，並使用跨層次交互作用分析影響幸福感之相關因素。本研究使用三個資料庫。樣本來自國際社會調查，包含30個國家及49,504個人樣本。本研究將樣本分為三個年齡層，年輕（20-34歲）、中年（35-64歲）和老年（65歲以上）。個人層次變項取自國際社會調查，國家層次變項取自世界銀行資料庫與全球繁榮指數。使用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分析30個國家之個人層次和國家層次變項對不同年齡層幸福感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一）30個國家中，有25個國家在三個年齡層幸福感呈現顯著差異。其中有20個國家老年人幸福感是三個年齡層中最低的。（二）透過階層線性模型，顯示老年人幸福感的差異有14%的變異受到國家因素影響，是三個年齡層中影響最大的。（三）國家層次變項中，發現社會資本對老年人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四）對老年族群而言，居住都市化程度與社會資本之交互作用達顯著，表示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會弱化居住都市化對幸福感的影響力。

關鍵詞：幸福感、社會資本、跨國比較、跨年齡層比較、老年人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2015年世界幸福感報告指出，「幸福」已被視為一個測量社會進步和公共政策目標的方式（Helliwell and Layard et al. 2015）。此報告書以2012-2014年的生活評估（life evaluation）測量158個國家，結果顯示在六個影響幸福感的因素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壽命、社會支持、自由、慷慨和無腐敗），社會支持的解釋力占30%，甚至超越GDP對幸福感的影響（Helliwell and Huang et al. 2015）。社會資本是一個有意義和廣泛描述社會中的信任、社會支持網絡，和親社會性的觀點（Helliwell and Layrd 2015）。Helliwell and Layard et al.（2015）指出，社會支持愈高，人民幸福感較高。社會資本主要來自家庭、鄰居、宗教和社區緊密關係的力量，會同時支持主觀福祉和生理健康（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此外，過去研究指出，在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現，年齡與幸福感呈現U型（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8; 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Portela et al. 2013; 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wift et al. 2014; Treas et al. 2011），意指中年人相較於年輕和老年人，較不幸福。然而近年研究卻有不同的結果，根據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The Gallup World Poll），在超過160個國家或地區的連續調查顯示，高收入英語系的國家，年齡和福祉呈現U型，最低的福祉在45-54歲之間（Steptoe et al. 2015）。然而在前蘇聯和東歐，主觀福祉會隨著年齡增加而大量降低；拉丁美洲也顯示主觀福祉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減少。此結果意謂在不同的國家，人民幸福感會受到國家整體因素的影響，而且年齡愈大幸福感可能會降低。回顧幸福感的研究中，大多仍以經濟面向為主，直到近年來開始重視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然而，鮮少文獻以社會資本概念為主，在脈絡系統中同時探

討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及跨層次交互作用對幸福感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社會資本及幸福感相關性在年齡層上的比較。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幸福感為主觀福祉的組成物之一，本段先介紹幸福感的概念，並說明幸福感的測量。第二、三部分探討過去研究國家層次變項，和個人層次變項如何影響幸福感。第四部分探討跨層次調節效果如何影響幸福感之相關文獻。

一、幸福感的概念與測量

過去大型研究、跨文化的研究，多數測量主觀福祉的認知和情感兩部分（Oishi 2010）。然而近年來重新定義主觀福祉測量，除了認知（Cognitive）、情感（Affect）外，還須包含有意義的生活（Meaningful of life）三部分（Oishi 2010; Swift et al. 2014）。其中認知部分以生活滿意度來測量（Diener et al. 1999）；情感部分包含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以及快樂程度；第三部分為有意義的生活，包含生命的意義、目的、自主性和自我接納等。然而情感和認知相對於有意義的生活是較易測量的。由於有意義的生活，牽涉到個人的生命歷程，可能在生命晚期較能體會。目前多數以質性進行調查，發現很大的文化差異，不易進行國際比較。故國際間大型資料庫探討幸福感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認知和情感兩部分（Oishi 2010）。本文主題幸福感屬於情感部分，則以快樂程度來測量。

二、國家層次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

雖然在跨國的資料庫顯示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愈高，人民的主觀福祉愈高（Deaton 2007; Easterlin and Angelescu 2009;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Swift et al. 2014）。然而Bartolini（2014）指出短期

2年內，國內生產總值與幸福感呈現正相關，但將時間拉長至15年，國內生產總值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消失（Bartolini and Sarracino 2014）。因此當國內生產總值不再是幸福感的關鍵預測值，引發我們去探討還有哪些國家因素會影響幸福感。

（一）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由於經濟並非影響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因此近年來學者與專家思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網絡情感的聯繫，有可能是影響幸福感的要素之一。故社會資本的概念在這十幾年來廣受關注與討論。

社會資本的概念始於1970年代末期，最早由Bourdieu（1985）提出社會資本的定義與經濟資本的由來，並確認其價值；之後由社會學者Coleman（1988）延伸並釐清社會資本的概念。直到Putnam（1995）明確訂出社會資本的規範及其理論與架構。以下將分別介紹Bourdieu、Coleman與Putnam等三位學者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並針對其意涵做概括性的討論。

Bourdieu於1985年法國Actes de la Recherche社會科學研究中，提出社會資本為「個人藉由群體網絡參與，在相互了解及承諾關係所形成的穩定網絡上，取得實際或潛在的資源，而這些關係或多或少是來自於制度化的」（Bourdieu 1985），然而當時卻沒有受到英語系國家的關注。在1985年Bourdieu又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分為兩個基本要素，一為社會關係的本身，使一個人成為群體的成員；另一為建立此關係後所能獲得的質與量。Bourdieu強調社會資本視為個人藉由參與具規範、制度性之組織或群體，且在具信任、互惠之基礎下的資源投入，進而形成另一種回饋性質的資本回報（莊芸鑫 2010）。換言之，社會資本為一種網絡資源，每一個在網絡中的成員都可以從中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取決於每個人實踐的能力大小而有所區別。

到了1988年，美國社會學者Coleman主張社會資本是由人力資本而來（Coleman 1988）。Coleman：「從功能面來定義，社會資本包

含兩個共同的要素，為社會結構和其成員間的特定行動」（Coleman 1990）一是構成社會結構的面向，另一要素為促進結構內個人行為目標的達成。社會資本是一種存在於社會結構中的資源，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動，進行資源或是資訊的交換，有助於社區及其成員可以達成期望目標（陳榮德 2004）。然而Coleman認為產生社會資本最重要社會結構的特徵是「封閉性」，指團體間充分連結的關係，以發揮團體規範的監督力量，一個具有廣泛值得信賴感和彼此信任的團體會比一個沒有這樣特質的團體達成更多目標，如家族、宗教團體等所形成的綿密社會網絡，使不守規範者難以存活（李金桂 2009）。由上述可見，社會資本主要源自於個人的社交網絡，與生活環境有極大的相關，因此隨著個人年紀的增長，生命歷程的轉換，在年輕、中年與老年時期，必定有著不同影響力，因此本研究亦探討社會資本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

先前學者主要聚焦於社會資本對個人層次的影響，然而社會資本不僅對於個人，在社區與國家層次亦有很大的影響（Portes 2000）。Putnam於1995年提出：「社會組織的特徵，如網絡（networks）、規範（norms）及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可以促進彼此利益的行動與合作」（Putnam 1995）。在社會資本高的社區，人們有較頻繁的公民參與，彼此對社區事務較有責任感，所表現的合作、熱忱與自治行為，有助於社會信任、認同與共同判斷力的發展。

綜合以上代表性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論述與定義，社會資本為「個人透過群體間的社會網絡或是社會結構中，爭取利益的能力」（Portes 2000）。強調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及規範，在團體或組織中，可以促使人們互相合作，以達成集體目標。在2015年世界幸福感報告也提出，社會資本透過兩種方式來提升人們的福祉，一為固有的效益，透過人際關係緊密的網絡，增加彼此間的信任、誠實並且互相扶持，進而生理和心理的福祉；另一方式為工具性的利益，促進經濟合作與交流，提升經濟效益和社會保險的發展。因此為求穩定發展和高福祉，各個國家應重視社會資本的發展（Sachs 2015）。

根據以上社會資本的理論與架構，本研究回顧社會資本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OECD）國家於2001年，定義社會資本為「社交的網絡有共享的規範、價值和了解，並促進團體間內部的合作」。在生態學的研究中，即使調整經濟相關的預測因子後，社會資本與幸福感還是呈現顯著正相關（Bartolini and Sarracino 2014; Becchetti et al. 2008; Bjørnskov 2003; Gundelach and Kreiner 2004）。根據Helliwell and Putnam（2004）研究顯示人們如果有親密的好友、知己或是有好的鄰居、同事的支持，其悲傷、孤獨、自尊心低落、吃或睡眠的問題是較小的。亦即，個體與周遭環境的社會網絡愈強，負向情緒發生機率可能較低。許多研究指出，社會資本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助益，包含低犯罪率、兒童福利、良好的公共衛生、有效率的政府管理、降低政府腐敗、與減低逃稅等（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Sampson et al. 1997）。由此看出，社會資本不管是對於個人或是社會，都是一個強大的正面影響。多數長達15年以上的研究指出，社會資本與主觀福祉的成長有顯著的正相關（Easterlin and Angelescu 2009; Easterlin et al. 2010; 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然而短期研究（例如2年內），其預測力是大幅減弱的（Bartolini and Sarracino 2014）。根據2013年歐盟提出活躍老化四大指標（Active Ageing Index，簡稱AAI），包含工作、社會參與、獨立的生活、活躍老化的能力（Zaidi et al. 2013）。同時也呼應，近年來提倡的活躍老化，退休後的老年人被鼓勵要有積極的社會參與和穩健的社交網絡。故本研究假設在多數的國家中，社會資本和幸福感呈正相關。

（二）吉尼係數（Gini Index）

一直以來經濟的成長關係到國家財富、國家競爭的實力，以及人民的福祉（well-being）。國家透過經濟發展改善或超越人民的基本需求，並延長人類的平均壽命，來增加福祉。過去多數研究皆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做為預測國家經濟發展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係 (Deaton 2007; Easterlin and Angelescu 2009;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Swift et al. 2014)。然而Oishi et al. (1999) 透過主觀福祉的長期追蹤，從1946年到1990年，在法國、日本和美國，儘管在此期間經濟增長，可支配收入急劇上升（即使控制了通貨膨脹和稅收），但主觀福祉仍然保持水平穩定。Oswald (1997) 發現與Oishi et al. (1999) 有相似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歐洲九個國家，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幸福感幾乎沒有增加 (Oswald 1997)。

相較於國內生產總值 (GDP)，吉尼係數呈現的收入不平等更能反映經濟與國家人民的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6)，亦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議題之一 (Frank 2012)。研究指出收入愈不平等 (吉尼係數愈大) 會降低國家人民的幸福感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6;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Diener and Tay於2015年，使用蓋洛普 (Gallup World Poll) 2005-2013年收錄完整共164國家，顯示吉尼係數與生活滿意度呈現負相關；與主觀福祉的負向情緒 (生氣、難過、壓力) 皆呈顯著正相關。此外Kahneman and Deaton (2010) 指出，幸福感會隨著收入增加而上升，但當年收入超過 \$ US 75,000，幸福感則不會再上升；反之低收入者，伴隨著負向的情緒與不幸，像是離婚、疾病等。然而，為什麼貧富差距愈大，人們幸福感的差距也愈大？學者引用Michalos (2017) 的多重差異理論來解釋，人們喜愛與他人比較，甚至與高於自己水平的人比較。當窮人與富人比較時，他會更不快樂；然而富人也不會因為跟窮人比較而變得更快樂 (Okulicz-Kozaryn and Mazelis 2016)。因此，當收入愈不平等 (吉尼係數愈高)，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減少人們對社會的信心與信任，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分離，產生負向情緒、貧窮、犯罪率等負面的影響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根據以上文獻結果，本研究假設吉尼係數愈高 (亦即貧富差距愈大) 的國家，人們幸福感愈低。

（三）平均餘命

平均餘命為「當代各年齡的人預期可以繼續存活의平均年數，由出生年代各年齡層的死亡機率來推算可存活의平均年數」（潘伶燕、邱淑媿 2011）。過去文獻指出平均餘命與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均呈現高度相關，但卻不會受到影響（Basabe et al. 2002; Jorm and Ryan 2014）。然而York and Bell（2014）調查女性的跨國生活滿意度，發現平均餘命與生活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此外Jorm and Ryan（2014）指出在個人層次中，生理健康是主觀福祉可靠的預測指標，在國家層面上亦是如此。隨著現代醫療技術不斷進步，健康狀況的改善，使得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然而活得愈長，也要活得健康，才有生命的意義、生活福祉可言。因此本研究推測，平均餘命較高的國家，其國民較健康，相對上幸福感可能較高。本研究假設，平均餘命愈高的國家，幸福感也愈高。

三、個人層次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

（一）年齡

年齡與幸福感呈U型相關，年齡增加幸福感下降，中年為最低點，之後逐漸上升。數個研究指出年齡愈大，幸福感愈低（Orviska et al. 2014; Portela et al. 2013;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utin et al. 2013; Swift et al. 2014; Treas et al. 2011）。但若使用年齡平方預測幸福感，其標準化之相關係數皆為正值，顯示年紀與幸福感的關係為U型曲線（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8; 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Orviska et al. 2014; Portela et al. 2013;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 Steptoe et al. 2015; Treas et al. 2011）。Helliwell and Putnam（2004）發現，隨著年齡增加至45-54歲，生活滿意度和

快樂程度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之後55-64歲時，生活滿意度和快樂程度開始緩緩上升。然而，在不同的國家，幸福感的最低點略有不同。Blanchflower and Oswald於2008年指出以年齡平方的回歸方程式估計，顯示在美洲國家35歲為幸福感的最低點；歐洲國家以生活滿意度來評估，顯示約45歲為最低點；拉丁美洲50歲為最低點；亞洲則為46歲。因此本研究根據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8)之結果，以35歲做為年輕與中年的分界點。

此外在眾多年齡與幸福感的文獻中，以Helliwell and Layard et al. (2015) 刊登在世界幸福感報告中最完整，當考慮國家層次因素，除了北美和紐西蘭、東亞等國呈現U型之外，多數國家幸福感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亦即老年人幸福感，相對青年人與中年人相對較低。因此本研究比較不同年齡層影響幸福感因素之差異，並將年齡層分為三組（年輕20-34歲、中年35-64歲、老年65歲以上）比較其差異性。

（二）性別

性別與幸福感的關聯中，表示女性較幸福。過去文獻指出男性較女性幸福（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wift et al. 2014）。然而有研究指出，如果考量國家環境因素，在國家治理較高的國家，女性的幸福感較高（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且，Portela et al. (2013) 與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 發現女性在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皆高於男性。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指出，男女幸福感的差異取決於國家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男女幸福感有顯著差異。

（三）工作

多數文獻指出，有償工作與幸福感呈正相關（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wift et al. 2014）。勞動參與會影響家庭的組成以及個人的福祉（Clark and Oswald 2002）。此外失業率會降低主觀福祉（Diener et al. 2015; Helliwell and Huang 2014; Lawless and Lucas 2011; Luechinger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假設，有償工作者，幸福感較高。

airiti

(四) 婚姻

多數研究指出，有伴侶者，幸福感較高（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Orviska et al. 2014; Portela et al. 2013; 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wift et al. 2014）。在臺灣2011年社會變遷資料庫選取55歲以上有結婚者，結果指出男女性的婚姻滿意度對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Lin 2015）。亦即當婚姻愈美滿，人們的幸福感愈高。故本研究假設，有伴侶者幸福感較高。

(五) 自評健康

先前多數研究皆指出，自覺健康狀況良好者，幸福感較高（Orviska et al. 2014; 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 Steptoe et al. 2015; Swift et al. 2014）。在Steptoe et al. (2015) 提到生理健康與主觀福祉可能存在著雙向的關係。健康不佳可能會導致主觀福祉的降低；然而主觀福祉高會降低生理健康對個人的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自評健康較佳的人，幸福感較高。

(六) 教育程度

過去文獻指出，教育程度愈高幸福感也愈高（Orviska et al. 2014;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utin et al. 2013）。然而Portela et al. (2013) 和Rodríguez and von Berlepsch (2014) 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幸福感愈低，生活滿意度也愈低。亦即教育似乎對主觀幸福感沒有直接影響，而是教育改善健康，從而間接提高主觀幸福感（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因此本研究假設教育程度愈高，幸福感較高。

(七) 家中學齡兒童數

過去相關研究指出，對於女性而言，有子女的婦女幸福感相較於無子女的婦女，幸福感較高（吳淑敏 2003）。此外Vanassche et

al. (2013) 指出有子女的家庭，其父母會感到較強烈的存在與依賴感，尤其對於男性而言，有子女對男性幸福感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家中學齡兒童數較多，幸福感較高。

(八) 宗教參與次數

過去研究發現有宗教信仰者，幸福感較高 (Portela et al. 2013;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wift et al. 2014)。此外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發現人們宗教信念愈強且頻繁參與教堂活動與主觀福祉有強烈的正相關，同時也可以促進社區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增加社區中的社會資本。因此本研究假設宗教參與愈頻繁，幸福感愈高。

(九) 居住都市化程度

本研究假設居住愈都市，幸福感愈高。居住在便利的都市，除了交通的便利性與可近性之外，可能有更完善的醫療和教育機構，有較多的活動與豐富的資源，也能促使長者有更多的社會參與 (Hsu and Chang 2015)。有研究指出在貧窮的國家，相較於都市，鄉下地區城鄉差距大，因此居住愈都市主觀福祉愈高 (Easterlin et al. 2011)。此外，White et al. (2013) 發現居住在綠地較多的城市，其心理壓力較小，福祉較高。

四、跨層次調節效果對幸福感的影響

近年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跨層次議題，Kozlowski and Klein (2000) 以全面系統理論，呼籲組織學者重視層次議題。要了解人類現象，應結合微觀 (micro) 和巨觀 (macro) 以跨領域的方式，探討個體內部因素 (如人格特質) 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彭台光、林鈺琴 2008)。

Swift et al. (2014) 指出，在GDP與年紀的交互作用下，GDP的高低，對老年人的影響比對年輕人的影響還大。在富裕的國家，年齡

愈高，幸福感愈高，相對貧窮國家（如東歐）則反之。可見得當一個國家其經濟愈好，不只平均壽命的延長，也能提供廣泛的政策服務，和更多的支持給予老年人，包括健康照顧體系、服務的輸送、基礎的建設（Lucas and Gohm 2000）。由此可見，單一變項與整體跨層次互動對幸福感的影響不同。因為每個年齡層其適應力及經驗不同，其因應策略也不盡相同。此外Rözer and Kraaykamp（2013）研究85個國家，原先國家層次之人民對國家社會、體制信任愈高，幸福感愈高。但在吉尼係數（表示所得分配不均）與社會信任之交互作用下，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當人民對國家社會、體制信任愈高，且貧富差距愈大時，幸福感反而會下降。人們對國家政府愈信任，但國家經濟貧富差距增加，人們的需求無法滿足時，幸福感便會隨之下降。交互作用的結果，我們發現個人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受到國家環境整體的調節後，反而國家因素對個人幸福感的影響較大。故支持本研究以跨層次交互作用探討對幸福感的影響。不同於過去大多以經濟為探討面向的文獻，本研究聚焦於社會資本對幸福感的影響，因此在交互作用的部分，探討社會資本對個人層次（性別、工作、婚姻、宗教參與、自評健康、教育程度、家中學齡兒童數、居住都市化程度）對幸福感的影響。

總結以上，由於幸福感並非簡單、單一面向（Diener et al. 1999）。所以當我們在研究幸福感時，必須考慮環境的特徵、個人的行為和特質皆可能與幸福感互相影響。根據以上文獻結果，本研究探討個人層次（如性別、工作、教育程度等等）與國家層次（如社會資本、國內生產總值、健康醫療支出等等）交互作用對幸福感的影響。

五、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依據上述文獻整理之結果，本研究探討社會資本及幸福感相關性之跨國與跨年齡層比較。研究假設的主要路徑分為三部分，假設1個人層次變項對幸福感有影響；假設2國家層次變項對幸福感有影響；

假設3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對幸福感有交互作用的影響。以下與各變項詳細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 假設1個人層次變項對幸福感有影響

假設1-1：男、女幸福感有顯著性別差異

假設1-2：有工作者幸福感較高

假設1-3：有伴侶者幸福感較高

假設1-4：自評健康狀況較佳者幸福感愈高

假設1-5：教育程度愈高幸福感較高

假設1-6：家中學齡兒童數愈多幸福感愈高

假設1-7：宗教參與愈頻繁者幸福感較高

假設1-8：居住愈都市幸福感愈高

(二) 假設2國家層次變項對幸福感有影響

假設2-1：社會資本愈高幸福感愈高

假設2-2：平均餘命愈高幸福感較高

假設2-3：吉尼係數對幸福感有顯著負向影響

(三) 假設3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對幸福感有交互作用的影響

假設3-1：社會資本對個人層次變項與幸福感有顯著調節作用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與路徑，畫出本研究之架構圖（見圖1）。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一) 個人層次

國際社會調查（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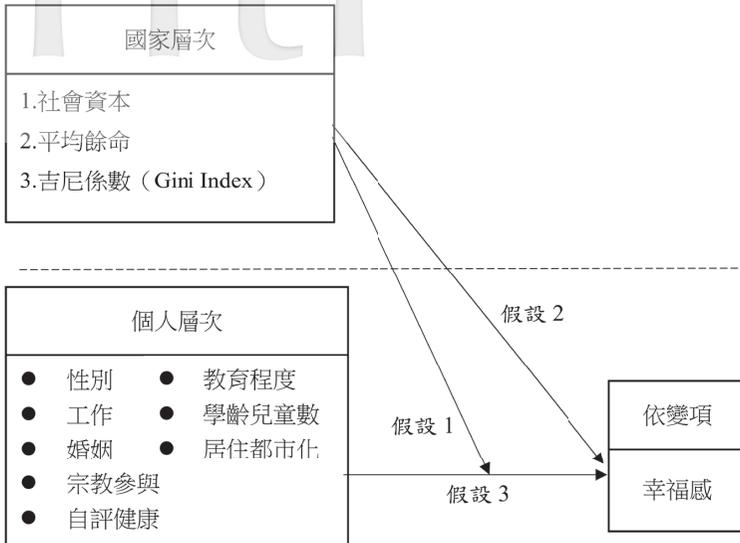


圖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ISSP) 自1983年成立，為歐美國家從事大規模社會調查的主要學術機構之一，目前已有48個會員國。ISSP計劃從1985年，每年經由會員大會議決，選定三年後的預訂調查主題，並在大會中規劃及設計兩年後調查的主題大綱，以及確認一年後調查的實際問項 (Smith 1992)。本研究取用的資料為2011年調查健康的資料，自2011年至2014年資料蒐集完成。本研究樣本包含30個國家。選取20歲以上的樣本，並將所有樣本之年齡分為三個年齡層，分別為年輕世代 (20-34歲)、中年世代 (35-64歲)、老年世代 (65歲以上)，見表1所示。

(二) 國家層次

1. 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

世界銀行成立於1944年，目前世界銀行出版的社會、經濟資料，和其研究成果，為許多國內外研究重要的基礎 (World Bank 2012)。

表1 30個國家三個年齡層之樣本數

國家名	20-34歲		35-64歲		65歲以上		全部
	<i>n</i>	%	<i>n</i>	%	<i>n</i>	%	
澳洲	234	12.1	1,114	57.5	588	30.4	1,936
比利時	605	20.2	1,723	57.6	661	22.1	2,989
保加利亞	169	17.3	529	54.1	279	28.6	977
智利	386	25.9	815	54.6	292	19.6	1,493
中國	1,149	20.8	3,466	62.8	904	16.4	5,519
克羅地亞	332	28.0	618	52.1	236	19.9	1,186
捷克	364	21.0	1,025	59.2	343	19.8	1,732
丹麥	357	26.5	756	56.2	233	17.3	1,346
芬蘭	274	22.3	732	59.5	224	18.2	1,230
法國	557	17.0	1,881	57.3	845	25.7	3,283
德國	357	21.8	902	55.2	376	23.0	1,635
英國	214	23.3	493	53.6	212	23.1	919
以色列	344	29.4	615	52.6	210	18.0	1,169
日本	201	16.2	717	57.7	325	26.1	1,243
南韓	347	23.4	890	60.0	247	16.6	1,484
立陶宛	268	23.7	608	53.9	253	22.4	1,129
荷蘭	201	13.7	855	58.4	407	27.8	1,463
挪威	378	21.1	1,055	59.0	355	19.9	1,788
菲律賓	372	32.3	656	56.9	124	10.8	1,152
波蘭	269	25.2	573	53.7	225	21.1	1,067
葡萄牙	174	17.2	577	57.0	261	25.8	1,012
俄羅斯	395	26.9	750	51.1	323	22.0	1,468
斯洛伐克共和國	154	13.9	698	63.0	256	23.1	1,108
斯洛維尼亞	288	27.0	529	49.7	248	23.3	1,065
南非	1,064	38.1	1,439	51.5	292	10.4	2,795
瑞典	226	20.2	587	52.4	308	27.5	1,121
瑞士	257	21.7	676	57.2	249	21.1	1,182
臺灣	592	27.7	1,159	54.3	383	17.9	2,134
土耳其	521	34.6	820	54.4	166	11.0	1,507
美國	353	22.8	873	56.3	324	20.9	1,550
總和	11,402	22.95	28,131	56.62	10,149	20.43	49,68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此本研究採用平均餘命與基尼係數等兩項客觀外部指標，作為國家層次預測個人幸福感的變項。

2. 全球繁榮指數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全球繁榮指數是列格坦研究機構 (Legatum Institute) 以八項綜合性的數據比較142個國家。數據來自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 (Gallup World Poll)、世界貿易組織、世界發展指標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世界價值等調查組成。包含八十九個因素，歸納為八大項，分別是：經濟、創業與機會、國家治理、教育、健康、人身財產與安全、個人自由及社會資本 (Lind 2014)。社會資本在全球繁榮指數以分數、排名來測量表示，本研究取用社會資本的分數，作為預測幸福感的國家層次變項，分數愈高，表示社會資本愈高。

二、變項測量與操作型定義

(一) 依變項

個人的幸福感以單題自評目前生活的快樂程度來測量，0 = 無法得知，1 = 非常快樂，2 = 很快樂，3 = 有一點快樂，4 = 不快樂也不難過，5 = 有一點不快樂，6 = 很不快樂，7 = 非常不快樂。本研究將自評快樂程度之編碼倒置，1 = 非常不快樂，2 = 很不快樂，3 = 有一點不快樂，4 = 不快樂也不難過，5 = 有一點快樂，6 = 很快樂，7 = 非常快樂。學者Abdel-Khalek (2006) 指出單題幸福感穩定性高達0.86，並與牛津幸福感測量量表 (Scale of happiness) 和生活滿意度量表 (Scale of life satisfaction)，有顯著的正相關與良好效度。此量表也與樂觀、希望、自尊、正向影響、外向性和生理心理健康的量表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在區別效度方面，也與眾多負向情緒量表 (包含焦慮、悲觀、負向影響、失眠等) 有一致性的顯著負相關。因此單題

幸福感是可信的、有效的，用於跨文化的幸福感比較（Abdel-Khalek 2006）。此外Lucas and Donnellan（2012）也指出在大型研究中，以單題代表幸福感，是普遍且在國際上是被認可的。

（二）獨立變項

1. 個人層次

個人層次的控制變項包含七個變項，各項操作定義見表2。

2. 國家層次

國家層次變項包含兩部分，分別來自兩項資料庫世界發展指標和全球繁榮指數，取用的類別變項見表3所述。

在全球繁榮指數中，社會資本由以下七項指標測量而來：(1) 捐

表2 個人層次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操作型定義
性別	1 = 男 2 = 女	1 = 男 0 = 女（重新編碼）
年齡	依照出生年份，以實際年齡呈現	以實際年齡呈現
最高教育程度	0 = 沒受教育 1 = 小學 2 = 國中 3 = 高中 4 = 高中後其他課程 5 = 低階高等教育，含技術學校 6 = 碩、博士	重新編碼 1 = 低教育程度（原0、1選項） 2 = 中等教育（原2、3、4選項） 3 = 高等教育（原5、6選項）
工作狀態	1 = 近期有工作 2 = 近期無工作，過去有 3 = 從沒有工作	重新編碼 0 = 沒工作 1 = 有工作
自評健康	過去一年內看醫生的次數 1 = 從不 4 = 經常 2 = 很少 5 = 總是 3 = 有時	變項倒置 1 = 總是 4 = 很少 2 = 經常 5 = 從不 3 = 有時
學齡兒童數	實際家中兒童數	0 = 無小孩 2 = 兩個小孩以上 1 = 一個小孩實際兒童數

表2 個人層次變項之操作型定義（續）

變項名稱	操作型定義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操作型定義
婚姻狀況	合法伴侶狀態 1 = 已婚 2 = 民事伴侶關係 3 = 配偶／同性伴侶分居（仍有合法婚姻） 4 = 配偶的離婚／合法民事伴侶分開 5 = 喪偶／民事伴侶死亡 6 = 未婚／單身	重新編碼與倒置 0 = 非已婚 1 = 已婚
宗教參與次數	1 = 一個星期很多次或是更頻繁 2 = 每周一次 3 = 一個月兩到三次 4 = 一個月一次 5 = 一年很多次 6 = 一年一次 7 = 少於一年一次 8 = 從不	變項倒置 1 = 從不 2 = 少於一年一次 3 = 一年一次 4 = 一年很多次 5 = 一個月一次 6 = 一個月兩到三次 7 = 每周一次 8 = 一個星期很多次或是更頻繁
居住地	1 = 大城市 2 = 郊區或城市外圍 3 = 一個城市或一個小城市 4 = 一個村莊 5 = 在鄉村的家或農場	變項倒置 1 = 在鄉村的家或農場 2 = 一個村莊 3 = 一個城市或一個小城市 4 = 郊區或城市外圍 5 = 大城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3 國家層次變項及測量定義

變項來源	變項	測量定義
世界發展指標	吉尼係數	根據勞倫茲曲線（Lorenz curve）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從勞倫茲曲線和絕對平等假想線之間的區域，表現為最大面積線下的百分比，0代表完全平等，100表示完全不平等（World Bank 2015a）。
世界發展指標	平均餘命	由出生年代各年齡層的死亡機率來推算可存活平均年數（World Bank 2015b）。
全球繁榮指數	社會資本	是一個制度、規範和價值，塑造我們社會的互動（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贈、捐獻的比例、(2) 幫助陌生人的比例、(3) 結婚比例、(4) 宗教參與次數、(5) 他人的可靠性、(6) 信任他人、(7) 志工的參與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2)。

根據全球繁榮指數，變項均以標準化處理，使其有統一的標準與可比較性。再以加權係數 (coefficient) 分別放入以幸福感、收入的回歸模型檢測。最後以分數和排名呈現，本研究取用社會資本的分數。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SPSS 18.0版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使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階層線性模型，呈現30個國家之個人層次和國家層次變項對不同年齡層幸福感的影響。遺漏值處理是以次數分配表計算各國變項遺漏的比例，全部變數中，30個國家遺漏值為5-17.5%。遺漏值部分再分別以各國變項之中位數取代之。為使變項具有可比較性，並對於數據的意義進行正確解讀。此外本研究除了類別變項性別、工作、婚姻之外，其餘序列變項包含教育程度、自評健康、學齡兒童數、宗教參與次數以及居住地等變項皆以標準化處理。國家層次變項社會資本、平均餘命、吉尼係數也以標準化處理，使變項具有可比較性，並對於數據的意義進行正確解讀。

描述性統計主要分析個人層次變項、國家層次變項之平均值與標準差，得到本研究樣本分析的概況。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根據每個國家三個年齡層幸福感平均數去分析是否有顯著差異。

階層線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三個年齡層分別之幸福感跨層次分析結果，參考 (謝俊義 2015) 步驟分為四部分 (1) 初始模型：亦稱為空模型 (null model)，此模型為隨機效果ANOVA，僅將幸福感 (結果變項) 放入模型中。(2) 固定效果模型 (Means-as-Outcomes Model)：加入個人層次變項 (性別、工作、婚姻、自評健康、教育程度、家中學齡兒童數、宗教參與、都市化程度)，亦即個人層次變項決定個體幸福感的變異。(3) 隨機脈絡效

果模型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將個人層次變項納入模型分析（第一層模型與隨機脈絡模型一樣），以及國家層次變項納入第二層模型的截距中，亦即國家層次（社會資本、吉尼係數、平均餘命）預測截距與斜率的變化。(4) 調節脈絡效果模型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with Interaction)：亦稱為截距與斜率做為結果模型，將第一層個人變項與第二層國家變項皆納入混合模型分析，第一層模型與隨機脈絡模型一樣，第二層則為多個解釋變項所預測的截距與斜率的變化，以探討社會資本與其他個人層次變項作交互作用（性別、工作狀態、婚姻、教育程度、自評健康、學齡兒童數、宗教參與次數，以及居住地等），結果將呈現有顯著影響的交互作用。

肆、分析結果

第一部分為描述性統計，對研究對象之特性提供初步的了解。第二部分以階層線性模型探討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交互作用對幸福感的影響。

一、描述性統計

(一) 個人層次變項

個人層次變項之樣本特性分布見表4。全部樣本為49,682人。年輕族群（20-34歲），樣本數為11,402人；中年族群（35-64歲），樣本數為28,131人；老年族群（65歲以上），樣本數為10,149人。在七個人口學變項中，除了性別之外，其餘變項在三組不同年齡層皆有顯著差異。男性的比例在三個年齡層中所占的比例約為45%，且三個年齡層男性所占比例無顯著差異（ $p = .986$ ）。年輕族群有工作者約64.81%；中年族群有工作者約68.8%；老年族群有工作者僅占12%。在婚姻狀態中，三個年齡層有伴侶的比例分別為39.76%、73.47%、

表4 個人層次變項之描述性分析

	20-34歲 (<i>n</i> = 11,402)		35-64歲 (<i>n</i> = 28,131)		65歲以上 (<i>n</i> = 10,149)		<i>p</i>
	<i>n</i>	%	<i>n</i>	%	<i>n</i>	%	
性別 (1 = 男性)	5,089	44.63%	12,582	44.73%	4,537	44.70%	.986
工作 (1 = 有)	7,390	64.81%	19,355	68.80%	1,218	12.00%	< .001
婚姻狀態 (1 = 有伴侶)	4,533	39.76%	20,668	73.47%	5,980	58.92%	< .001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i>p</i>
年齡	27.19	4.28	49.42	8.50	72.90	6.26	< .001
自評健康	3.76	1.02	3.55	1.06	3.15	1.09	< .001
教育程度	2.25	0.56	2.07	0.63	1.80	0.69	< .001
家中學齡兒童數	0.46	1.06	0.89	1.72	0.41	1.25	< .001
宗教參與次數	3.15	2.31	3.16	2.27	3.49	2.38	< .001
都市化程度	3.57	1.28	3.33	1.28	3.25	1.26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8.92%。在年齡分布中，年輕族群平均年齡為27.19歲（SD = 4.28），中年族群平均年齡為49.42歲（SD = 8.50），老年族群平均年齡為72.9歲（SD = 6.26）。自評健康狀況中，老年族群的自評健康較差（ $\bar{X} = 3.15$ ）。教育程度方面，年輕族群教育程度最高（ $\bar{X} = 2.25$ ）介於「中-高等教育」，老年族群最低（ $\bar{X} = 1.8$ ）介於「低-中等教育」。在家中學齡兒童數分布，三個年齡層以中年族群最高（ $\bar{X} = 0.89$ ）。在宗教參與次數方面，以老年族群最高（ $\bar{X} = 3.49$ ）。居住都市化程度方面，以年輕族群最高（ $\bar{X} = 3.57$ ）。

（二）國家層次變項

見表5所示。在平均餘命，其平均值為77.98歲，最大值為日本83.10歲，最小值為南非56.10歲。在健康醫療支出（占總GDP%），平均值為8.85。在社會資本方面，平均值為1.12，標準差為1.89。由

表5 國家層次之描述性分析

國家層次 (N = 30)	社會資本	平均餘命	吉尼係數
澳洲	4.12	82.05	34.94
保加利亞	-0.94	74.31	36.1
智利	-0.27	79.57	50.84
中國	0.82	75.2	42.06
臺灣	1.07	79.51	33.6
克羅地亞	-1.84	78.08	31.98
捷克	0.34	76.92	26.13
丹麥	4.31	80.05	29.08
芬蘭	3.59	80.63	27.12
法國	0.57	81.97	33.1
以色列	1.11	81.7	42.78
日本	1.18	83.1	32.11
南韓	0.07	81.21	30.2
立陶宛	0.21	73.86	35.15
荷蘭	3.58	81.1	27.99
挪威	4.47	81.45	25.9
菲律賓	-0.38	68.55	43.04
波蘭	0.3	76.11	26.12
葡萄牙	-0.26	80.37	36.04
俄羅斯	-0.33	70.37	41.59
斯洛伐克共和國	0.3	76.8	32.39
斯洛維尼亞	0.71	80.12	25.59
南非	-0.71	56.1	63.38
瑞典	2.93	81.7	27.32
瑞士	2.87	82.7	31.64
土耳其	-3.26	74.86	40.17
美國	2.88	78.74	41.06
比利時	1.5	80.39	27.59
德國	1.87	80.89	30.13
英國	2.7	80.9	32.57
平均值	1.12	77.98	34.59
標準差	1.89	5.48	8.3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可見，在30個國家中社會資本的分布較分散。在吉尼係數方面，平均值為34.59，最大值為南非63.38，最小值為斯洛維尼亞25.59。

二、階層線性分析

（一）解釋模型順序

在本研究中假設資料是巢狀結構，亦即人民的幸福感會受到個體因素影響，個體因素又會受到國家整體環境的影響。因此為了瞭解各年齡層中，國家因素是否有顯著不同，我們先使用初始模型（null model）來檢測依變項之ICC值（模型一）。模型二檢定個人層次變項對於幸福感的影響為何。模型三檢測國家層次變項如何影響幸福感。模型四為跨層次交互作用上對幸福感的影響，亦即國家層次變項如何調節個人層次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為確認各個階層線性模型的適配度，了解該資料是否適合進行階層線性分析（HLM）。表6下方的 $-2 \log \text{likelihood}$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與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三項指標，皆隨著模式一至四，放入的解釋變項愈多，其值愈小。此外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也隨著模式一至四，逐漸變小，表示其尚未被解釋的部分，愈來愈少（Woltman et al. 2012）。

1. 初始模型（The null model）

見表6所示之初始模型，各個年齡層的模式一，三個年齡層之截距項分別為5.23；5.05；4.92，皆達顯著水準。此外各年齡層之組間變異數和組內變異數，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 ），滿足階層線性分析依變項的組間變異成分與組內變異成分必須存在的要求。年輕族群與中年族群ICC值皆為0.08，屬中度組內相關。老年族群ICC值0.14為高度組內相關，表示老年人幸福感的差異有14%的變異由國家因素所影響（邱皓政、溫福星 2007；Woltman et al. 2012）。亦即人民幸福

表6 各年齡層幸福感之跨層次分析結果

	20-34歲 (n = 11402)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固定組件				
截距	5.23***	5.32***	5.31***	5.31***
個人層次				
性別 (1 = 男性)		-0.04	-0.04	-0.04
工作 (1 = 有)		0.14***	0.14***	0.14***
婚姻狀態 (1 = 有伴侶)		0.18***	0.18***	0.18***
自評健康		0.04***	0.04***	0.04***
教育程度		0.08***	0.08***	0.08***
家中學齡兒童數		-0.02	-0.02	-0.02
宗教參與次數		0.08***	0.09***	0.09***
都市化程度		0.03**	0.03**	0.02*
國家層次				
社會資本			0.08	0.08
平均餘命			0.00	0.00
交互作用				
都市化程度 × 社會資本				-0.02*
變異組件				
組間方差	0.10***	0.10***	0.09***	0.09***
組內方差	1.03***	1.00***	1.00***	1.00***
ICC	8.78%	9.15%	8.54%	8.54%
-2 log likelihood	32,764.55	32,550.66	32,555.84	32,556.72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32,768.55	32,554.66	32,559.84	32,560.72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tion	32,783.23	32,569.34	32,574.52	32,575.40
35-64歲 (n = 28131)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固定組件				
截距	5.05***	5.15***	5.15***	5.14***
個人層次				
性別 (1 = 男性)		-0.06***	-0.06***	-0.06***
工作 (1 = 有)		0.17***	0.17***	0.17***
婚姻狀態 (1 = 有伴侶)		0.35***	0.35***	0.35***

表6 各年齡層幸福感之跨層次分析結果（續）

35-64歲 (n = 28131)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自評健康		0.07***	0.07***	0.07***
教育程度		0.07***	0.07***	0.07***
家中學齡兒童數		0.02**	0.02**	0.02**
宗教參與次數		0.06***	0.06***	0.06***
都市化程度		0.00	0.00	0.00
國家層次				
社會資本			0.14*	0.13*
平均餘命			0.03	0.04
交互作用				
都市化程度 × 社會資本				-0.02***
變異組件				
組間方差	0.09***	0.08***	0.07***	0.07***
組內方差	1.00***	0.95***	0.95***	0.95***
ICC	8.02%	8.04%	6.54%	6.58%
-2 log likelihood	79,833.36	78,552.99	78,555.02	78,492.21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79,837.36	78,556.99	78,559.02	78,496.21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tion	79,853.85	78,573.48	78,575.51	78,512.70
65歲以上 (n = 10149)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固定組件				
截距	4.92***	5.11***	5.11***	5.10***
個人層次				
性別 (1 = 男性)		0.03	0.03	0.03
工作 (1 = 有)		0.04	0.04	0.04
婚姻狀態 (1 = 有伴侶)		0.25***	0.25***	0.24***
自評健康		0.09***	0.09***	0.09***
教育程度		0.07***	0.07***	0.07***
家中學齡兒童數		0.00	0.00	0.00
宗教參與次數		0.09***	0.09***	0.09***
都市化程度		0.03**	0.03**	0.03**

表6 各年齡層幸福感之跨層次分析結果（續）

	65歲以上 ($n = 10149$)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國家層次				
社會資本			0.22***	0.21**
平均餘命			0.13	0.13
交互作用				
都市化程度 × 社會資本				-0.04***
變異組件				
組間方差	0.17***	0.14***	0.08***	0.08***
組內方差	0.98***	0.94***	0.94***	0.94***
ICC	14.43%	13.24%	7.76%	7.82%
-2 log likelihood	28,739.84	28,370.43	28,371.21	28,360.72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28,743.84	28,374.43	28,375.21	28,364.72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28,758.29	28,388.88	28,389.66	28,379.16

*** < .001, ** < .01, *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感確實會受到國家整體環境因素之影響，並且老年人的幸福感，受到國家變數影響更大於年輕和中年族群。

2. 固定效果模型（Means-as-Outcomes Model）

表6模式二，開始加入個人層次共七個變項做為解釋變數，且設定為固定效果，亦即七個個人解釋變項的迴歸係數，以及截距在30個國家是一樣的數值（常數），即迴歸係數在組內具同質性。此時，由於組別差異完全不存在，即等同於傳統的多元迴歸模型。

結果以各年齡層分別敘述，對於年輕族群，有工作（ $\gamma = .14$, $p < .001$ ）、有伴侶（ $\gamma = .18$, $p < .001$ ）、自評健康較佳（ $\gamma = .04$, $p < .001$ ）、教育程度愈高（ $\gamma = .08$, $p < .001$ ）、宗教參與愈多（ $\gamma = .08$, $p < .001$ ），以及居住愈都市（ $\gamma = .03$, $p < .01$ ），幸福感較高。在中年族群，女性（ $\gamma = -.06$, $p < .001$ ）、有工作（ $\gamma = .17$, $p < .001$ ）、有

伴侶 ($\gamma = .35, p < .001$)、自評健康較佳 ($\gamma = .07, p < .001$)、教育程度較高 ($\gamma = .07, p < .001$)、家中學齡兒童愈多 ($\gamma = .02, p < .01$)、宗教參與愈頻繁 ($\gamma = .06, p < .001$)，幸福感較高。在老年族群，有伴侶 ($\gamma = .25, p < .001$)、自評健康較佳 ($\gamma = .09, p < .001$)、教育程度愈高 ($\gamma = .07, p < .001$)、宗教參與次數愈頻繁 ($\gamma = .09, p < .001$)、居住愈都市 ($\gamma = .03, p < .01$)，幸福感較高。

3. 隨機脈絡效果模型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模式三將國家層次變項加入，如表6所示。個人層次變項的顯著表現皆與模式二相似。然而可以明顯看出三個年齡層中，國家層次對幸福感的影響有很大的差異。對於年輕族群而言，在模式三，顯示社會資本 ($\gamma = .08$)、平均餘命 ($\gamma = .00$) 和基尼係數 ($\gamma = -.09$) 對幸福感皆無顯著影響效果。表示這三個國家變項可能不是影響年輕族群幸福感的因素。在中年族群，模式三之國家層次變項中，僅有社會資本 ($\gamma = .14, p < .05$) 對幸福感有顯著影響效果。當國家的社會資本愈高，人民幸福感較高。在老年族群，模式三，僅有社會資本 ($\gamma = .22, p < .001$) 對幸福感有顯著影響效果。此外，本研究也以鄒氏檢驗 (Chow tests) 檢定社會資本及居住都市化程度在不同的年齡層是否相同 (Teese et al. 2007)。我們使用全部樣本去進行鄒式檢驗 (Chow tests)。根據檢定結果，三個年齡層，社會資本 (sum of least squares = 1280.69, $F = 1129.19, p < .001$)、居住都市化程度 (sum of least squares = 28.82, $F = 25.41, p < .001$) 皆呈現顯著差異。因此三個年齡層的模型間是可以比較的。總結以上，三個年齡層在國家層次中，社會資本對老年族群的影響最大。

4. 調節脈絡效果模型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with Interaction)

如表6所示，模式四，分別用三個年齡層探討其差異。在年輕族群，居住都市化程度 ($\gamma = -.02, p < .05$) 與社會資本之交互作用達到

顯著，表示社會資本會弱化都市化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力。亦即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居住都市化程度高低對幸福感的影響力已經被淡化。在中年族群，居住都市化程度 ($\gamma = -.02, p < .001$) 與社會資本之交互作用皆達到顯著。表示社會資本會弱化都市化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力。在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會淡化居住都市化程度高低對幸福感的影響力。在老年族群，居住都市化程度 ($\gamma = -.04, p < .001$) 與社會資本之交互作用達到顯著，表示社會資本會弱化都市化變項對幸福感的正向影響力。一般認知裡，當個人居住愈都市，其便利性、資源較多，幸福感亦較高。但加入國家因素社會資本的調節後，即使個人居住於鄉村地區，其幸福感也會因為國家的社會資本高，其幸福感也較高。在隨機效果，我們已知國家的社會資本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以HLM來估計「影響效果是否存在個人之間的差異」，即為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 (Bryk and Raudenbush 1987)。根據隨機效果估計 (變異組成)，在20-34歲年輕族群，截距、都市化程度的檢驗統計量分別為2082.19 ($df = 26, p < .001$) ; 30.06 ($df = 26, p > .05$)，顯示在初始狀態下，年輕族群的幸福感，受到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呈不顯著。35-64歲中年族群，截距、都市化程度的檢驗統計量分別為4074.94 ($df = 26, p < .001$) ; 83.71 ($df = 26, p < .001$)，顯示在初始狀態下，中年族群的幸福感，受到都市化程度的影響呈顯著。65歲以上老年族群，截距、都市化程度的檢驗統計量分別為1256.72 ($df = 26, p < .001$) ; 76.87 ($df = 26, p < .001$)，顯示在初始狀態下，都市化程度對老年族群的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

伍、討論

前述結果顯示，影響幸福感之相關因素有年齡層的顯著差異。本段首先針對個人層次變項在不同年齡層的顯著影響因素做討論與比較，試圖解釋各年齡層影響幸福感因素差異的原因。第二部分，接續探

討論國家層次變項在不同年齡層的影響幸福感因素差異的可能原因。最後則比較三個年齡層，跨層次交互作用上，影響幸福感因素之差異。

一、個人層次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

個人層次的變項中，有無伴侶、自評健康狀況、教育程度高低、宗教參與次數，在三個年齡層對幸福感有一致的正向影響，與過去文獻結果相同（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在性別方面，僅在中年族群有顯著：中年女性的幸福感較高。可能原因之一是社會上對於中年人的期待是，事業有一定的基礎、經濟穩定、家庭圓滿，尤其「男性」經濟支柱的角色仍是主流印象，為主要家計的負責人，承受著經濟重擔壓力，「上有父母須供養，下有兒女需照顧」。當然近年來女性主義意識抬頭，許多女性也在社會上、工作表現上有傑出的表現。現代女性已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可投入時間與資本以滿足個人需求與自我實現（楊文山、王乃琳 2012）。此外在情感表達上，男性相較於女性不易表露自己的情感，反之女性則更容易從友誼、孩子、同事和老闆等人際關係的相處中，找到快樂感、實現自我價值。本研究結果與York and Bell（2014）一致。

在工作狀態方面，年輕族群、中年族群皆有顯著影響，表示對於年輕、中年人而言，有工作者幸福感較高，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同（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在老年族群，有無工作與幸福感則無顯著關聯性。推測其可能原因為本研究老年族群樣本，有工作者比例（12%）較少，因此統計結果無法看出有無工作對幸福感的影響。

家中學齡兒童方面，僅對中年族群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對中年族群而言，家中學齡兒童愈多，幸福感較高。與Vanassche et al.（2013）指出家中子女數愈多幸福感愈高的研究結果相似。然而本研究受限於二手資料庫，僅取用家中學齡兒童此變項。根據本研究之描述性統計結果，指出家中學齡兒童平均為0.46，且兒童個數0-2

airiti

人的累積比例高達90%以上，表示多數中年族群以「沒有子女」或是「1-2名子女」占大多數，與過去農業社會每戶子女數量眾多時不同。因此可以推測當家中有子女，雖增添了家庭的經濟負荷，但也拉近家人之間彼此的距離，情感的聯繫也更加緊密，因此家中學齡兒童愈多，中年族群的幸福感也愈高。

在居住都市化程度上，對年輕、老年族群皆有顯著影響，表示對年輕和老年族群而言，居住愈都市者，幸福感較高。與Hsu and Chang (2015) 在臺灣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與某些研究結果不同 (Portela et al. 2013; Rodríguez-Pose and von Berlepsch 2014)。推測其可能原因為居住愈都市相較於鄉下，人與人距離、網絡較疏遠，社會支持可能較不足，因此過去文獻指出，居住愈鄉下，幸福感較高。然而在本研究則顯示居住愈都市，幸福感較高，推估可能原因對老年人而言，居住在便利的都市，除了醫療、交通的可近性之外，活動多元、資源豐富，也促使長者有更多的社會參與。此外Easterlin et al. (2011) 的研究指出，在開發中國家，較能顯示居住都市與鄉村間幸福感的差異，居住愈都市幸福感愈高；反之，居住鄉村幸福感會降低。在Hsu and Chang (2015) 之研究結果，也顯示居住在都市的長者，覺得自己有較年輕化的趨勢，具有較高的經濟滿意度、抑鬱傾向較低，因此居住愈都市者，幸福感較高。

二、國家層次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

國家層次因素的部分，社會資本對中年族群和老年族群的幸福感，有顯著影響效果。此結果與近年來許多文獻結果一致 (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 Portela et al. 2013;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Sachs 2015)。特別是對於老年人而言，在本研究社會資本對老年人幸福感的影響之大 ($\gamma = .22, p < .001$)，更甚年輕與中年族群 ($\gamma = .14, p < .05$)。2015年世界幸福感報告指出「社會資本」是一個有意義和廣泛描述社會中的信任、社會支持網絡和親社會性的觀點。學者對社會

資本的定義為來自家庭、鄰居、宗教和社區緊密關係的力量，包含婚姻、家庭、朋友與鄰居的聯繫、工作職場關係、公民參與（個人和集體）、誠信和互信，並指出社會資本與主觀福祉、生理健康有顯著相關（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老年人自工作職場退出，社會角色的轉變，對於生理、心理皆是一大衝擊，因此在社會資本高的社會中，經由互信互惠的人際網絡互動，可以提高個人的自尊、自我效能和歸屬感，因此促進個人生理和心理健康（鄭惠玲、江東亮 2002；Kawachi et al. 1999）。此結果同時也呼應Cramm and Nieboer（2013）的研究發現，顯示鄰里間的社會資本、社會凝聚與老年人的福祉有顯著的正相關。由上述得知，社會資本對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性。

在平均餘命上，對三個年齡層而言，皆無顯著的影響。平均餘命愈高的國家，表示國家福利制度愈好，健康醫療支出較高，同時也代表國家經濟發展較好，有足夠的能力提供人們良好的就醫醫療環境，延長平均壽命（York and Bell 2014）。然而並不表示國家的平均壽命愈長，幸福感就愈高。Jorm and Ryan於2014年提出，平均餘命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呈現正相關，但卻無顯著的影響，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此外Diener et al.（2009）也指出，在較富裕的國家，生活環境、醫療品質較好，但現代化社會步調快速、匆忙，人們也會因此而感受到較大的壓力與產生負面情緒。

在基尼係數的部分，在年輕族群呈負相關，在中年與老年族群呈正相關，但在三個年齡層皆呈現無顯著影響。根據歐洲多層次分析的結果，調整個人與國家收入後，收入愈不平等，幸福感較低（Fahey and Smyth 2004）。收入愈不平等（基尼係數愈高），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減少人們對社會信心與信任，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分離與社會凝聚力的下降（Kawachi et al. 1999），產生負向情緒、貧窮、犯罪率等負面的影響（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然而，某些研究指出國家收入不平等有時是必要的，可以促進經濟活動與競爭力（Alesina et al. 2004; Verme 2011）。De Haan and Sturm（2000）提到，在資本

主義下，國家經濟自由與創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雖然擴大貧富差距，但也促成個人成功的機會，進而提升幸福感。因此，由上述得知，尚無法直接斷定國家收入不平等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三、跨層次交互作用對幸福感的影響

個人層次都市化程度與國家層次社會資本之交互作用，對三個年齡層的幸福感的影響皆有顯著的影響。針對交互作用結果的解釋，參考Lin（2015）與Rözer and Kraaykamp（2013）表示社會資本弱化都市化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力。本來居住都市化程度愈高，個體幸福感愈高，然而居住都市化與社會資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在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其都市化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就會降低。在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表示人們社會網絡關係的密切，對於社會的信任，和親社會性的觀點強烈，使人們不管居住於何處，其家庭、鄰居、宗教和社區緊密關係的力量，會同時支持主觀福祉和生理健康（Helliwell and Putnam 2004）。當個體有較強的社會連結、社會網絡，他會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包含婚姻伴侶、家庭、朋友與鄰居的聯繫、工作職場關係、公民參與（個人和集體）等連結，使其有足夠的能力去抵抗負面的情緒和憂慮（Sachs 2015）。當運用在社區或是國家層面，根據Helliwell and Huang（2014）長期追蹤的研究指出，有較高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信任的國家，可以較快樂、有效的，處理並渡過危機。此外在互惠、信任的環境下，社區可以達成更大的目標或理想，勝過個體利益的加總（Putnam 1995）。Cramm and Nieboer（2013）在荷蘭鹿特丹的研究分析社會的凝聚力和社會資本對社區老人福祉的重要性，結果顯示婚姻狀況與收入多寡會受到鄰里社會資本與社會凝聚力的影響。該結果僅有第二層次-社區鄰里的社會資本和社會凝聚力對幸福感的影響，尚無跨層次之交互作用，但已顯示社會資本與社會凝聚力對老年福祉的重要性。根據2015年世界幸福感報告中提到，社會資本對於福

社是非常重要的，可能透過直接或間接影響。呼應本研究之結果，對於三個年齡層而言，社會資本弱化都市化變項對幸福感的影響力。尤其對老年人而言，社會資本影響更重要。亦即國家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關鍵因素之一。

四、理論意涵

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在於藉由情感性和工具性的效益，來提升人們的福祉 (Sachs 2015)。在情感效益上來說，透過人際關係網絡，從關係緊密的知心者 (confidant)、網絡關係的交友圈 (networks) 到社會參與 (community) 的歸屬感 (Lin et al. 1986)，藉由信任與互相扶持，在此社會過程，促進正向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在工具性的效益來說，透過人際間的網絡包含由鄰居朋友所獲得的實際協助 (如升遷機會)；藉由當志工助人，獲得心靈上的滿足等等。老年人經歷人生中壯年時期的鼎盛，面臨生理、心理和社會結構的轉變，亦可能喪失配偶、摯友、家人等直接的情感支持。因此，相較於年輕與中年族群，當老年人的自身社會資本的情感性效益逐漸減弱，運用國家治理鞏固工具性與情感的社會資本，極大化社會資本的效益，藉由社會資源的連結，有益於直接促進正面的生活福祉，增加人民幸福感。

Nan Lin (2008) 認為社會資本就是資本理論的延伸，也就是說，個人對社會關係投資亦預期能夠有回饋。該期待不全然是金錢利益上的回收，個人花心思、時間去經營一段關係、維持信任感，也是社會資本的一種投資。而在資源方面，則分個人資源與社會資源，個人資源指的是個人擁有的有形或無形的資源，社會資源則是透過社會連結所獲得的資源。整體來說，社會資源對個人的潛在效益較大。Coleman (1990) 則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下的特性與資源，能夠為個人帶來助益，同時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共善的概念。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資本也存在著交換的概念，個人以自己的資源 (如捐錢) 去交換最佳的資源。用小我對社會的付出，使需要的其他人受益，共

同創造大我的社會安定，就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整體的社會資本更加豐厚。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是否居住於都市，醫療、交通的便利性、資源的可及性對於老年人的幸福感，會受到國家的社會資本所影響。呼應Bourdieu（1985）所提出的概念，當個人參與群體網絡，相互了解及承諾後形成穩定社會網絡，而從中取得實際或潛在資源，而這些社會關係可能是制度化的結果。國家是制度下的集合團體，人民與國家即是穩定網絡，本研究中探討的都市、醫療與交通便利性以及資源的可及性，就如同Bourdieu所謂的實際或潛在資源，也就是當國家治理運作愈健全，社會資本愈強，愈能提供有形或無形的資源給人民，進而對人民的幸福感有正面的影響。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以下的限制。首先本研究資料來源受限於可取得的資料。由於本研究樣本取自國際社會調查資料庫，為二手資料，各國變項在調查時並非全部變項皆可取得，經過審慎思考後，某些變項必須取捨。第二，本研究僅測量幸福感的部分，無法推估認知和有意義的生活福祉。由於幸福感屬於正向心理學主觀福祉之下，而主觀福祉的測量包含了三個部分，情感、認知、有意義的生活福祉。情感與認知部分與個人的生命周期有關，較易測量；有意義的生活為生命晚期較能體會的感受，每個生命階段的意義也不同，大多以質性研究來測量。然而這三個部分並非有一致性的意義測量，如一個人的生命充滿意義，但或許不快樂。因此本研究屬於情感部分，無法推估其他兩部分的結果。第三，無償工作者的就學、家庭主婦、退休與失業的身分認定，實難在目前的資料結構，有清楚的歸類。以退休而言，現有資料無法判定該樣本是主觀意願的退休，還是因病或其他原因被迫離職，導致沒有工作。而家庭主婦也有可能料理家務之餘，也有從事彈性工作，賺取有償薪水以維生計。像是工作狀況是以有無工作來測

量，但是對於老年人而言沒工作是退休，但對年輕人而言則是失業。此外婚姻狀況亦是如此，以有、無伴侶類別變項做分類，對於年輕人而言，無伴侶是尚未找到結婚對象或是無結婚的計畫，但對於老年人而言可能是喪偶的人生重大事件影響。因此研究者必須努力了解過程基本（潛在的）適應力，即人們對於不同情況發生的適應力。但對於這些影響的過程，所知甚少。第四，變項的解讀及其代表意義，需考量原資料庫中調查的題目。像是居住都市化程度，取自資料庫中居住地的調查，受測者以目前居住地為答。然而，其過去是否有搬遷及其原因則無在本研究中討論。對老年人而言，居住都市或鄉下有時並非自己所選。目前多數老年人仍與兒女同住為主，但也可能因為觀念、生活習慣的不同，而產生摩擦。因此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社會資本更顯得重要，透過社會參與，增進長輩們社會網絡的連結與社會信任，是我們皆須共同努力的目標。此外亦可透過宗教、志願性服務團體的參與、漸進式退休或鼓勵長者二度就業，增強老年人社會網絡的連結，豐富生活也貢獻社會，進而促進其生理和心理上的福祉。

在未來研究方向上，可透過長期追蹤方式對主觀福祉的測量更完整。國際社會調查資料庫幸福感的調查已追蹤多波，如果可以做長期追蹤調查，勢必可以得到更精確的因果關係以及各國幸福感的變化曲線。近年來，各領域專家開始廣泛地分析如何促進人民福祉的國家政策建議，以及心理健康與死亡率相關等研究與措施，因此我們需要長期追蹤的證據探討政策相關的提案與主觀福祉之間的因果作用。

陸、結論

本研究指出多數國家，老年人的幸福感最低。此外三個年齡層中，社會資本對老年族群的影響最大。本研究也發現社會資本弱化居住高度都市化對幸福感的影響力。亦即對老年人而言，在社會資本愈高的國家，無論是在都會或是鄉村地區，幸福感差異不大。因此，當

經濟因素已經不是影響幸福感的唯一因素，運用國家治理鞏固工具性與情感的社會資本，極大化社會資本的效益，藉由社會資本的強化，擴大潛在與直接社會資源的連結，有益於直接促進正面的生活福祉，增加人民幸福感。

airiti
參考文獻

- 吳淑敏（2003）婦女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學刊，20: 119-140。
- 李金桂（2009）運用社會資本自組都市更新會實施更新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皓政、溫福星（2007）脈絡效果的階層線性模型分析：以學校組織創新氣氛與教師創意表現為例。教育與心理研究，30(1): 1-35。
- 莊芸鑫（2010）社會資本與壓力、休閒參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以金門縣山外社區為例。國立高雄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榮德（2004）組織內部社會網絡的形成與影響：社會資本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台光、林鈺琴（2008）組織現象和層次議題：非獨立性資料的概念和實徵。組織與管理，1(1): 95-121。
- 黃立凱（2002）社區網路對居民社會資本之影響。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文山、王乃琳（2012）臺灣與香港生活與婚姻幸福感的比較研究。應用倫理評論，52: 115-139。
- 潘伶燕、邱淑媿（2011）台灣地區1991-2007年男女性之健康差距：以平均餘命，死亡率及潛在生命年數損失為指標。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0(2): 135-149。
- 鄭惠玲、江東亮（2002）臺灣的社會資本與自評健康。臺灣公共衛生雜誌，21(4): 289-295。
- 謝俊義（2015）多層次分析：理論、方法與實務。臺北：鼎茂。
- Abdel-Khalek, A. M. 2006. "Measuring Happiness With a Single-item Scal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4(2): 139-150.
- Alesina, A., R. D Tella, and R.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9-10): 2009-2042.
- Bartolini, S. 2014. “Build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Greater Happines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5(4): 587-602.
- Bartolini, S. and F. Sarracino. 2014. “Happy For How Long? How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Relate to Happiness Over Time.” *Ecological Economics* 108: 242-256.
- Basabe, N., D. Paez, J. Valencia, J. L. Gonzalez, B. Rimé, and E. Diener. 2002. “Cultural Dimension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limate, and Emotional Hedonic Level.” *Cognition & Emotion* 16(1): 103-125.
- Becchetti, L., A. Pelloni, and F. Rossetti. 2008. “Relational Goods, Sociability, and Happiness.” *Kyklos* 61(3): 343-363.
- Bjørnskov, C. 2003. “The Happy Few: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Kyklos* 56(1): 3-16.
- Blanchflower, D. G. and A. J. Oswald. 2008.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8): 1733-1749.
- Bourdieu, P. 1980.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1: 2-3.
- Bourdieu, P. 1985. “The Forms of Capital. ”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 Bryk, A. S. and S. W. Raudenbush. 1987.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to Assessing Chang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1): 147-158.
- Clark, A. E. and A. J. Oswald. 2002. “A Simple Statis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How Life Events Affect Happ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1(6): 1139-1144.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ramm, J. M. and A. P. Nieboer. 2013. "Relationships Between Frailty, neighborhood Security, Social Cohesion and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ople."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13(3): 759-763.

De Haan, J. and J. Sturm. 200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2): 215-241.

Deaton, A. 2007. "Income, Ag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317. <http://www.nber.org/papers/w13317>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Diener, E., E. Sandvik, and W. Pavot. 2009. "Happiness is the Frequency, Not the Intensity, of Positive Versus Negative Affect." Pp. 213-231 in *Assessing Well-Being*, edited by E. Diener.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Diener, E., E. M. Suh, R. E. Lucas, and H. L. Smith.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76-302.

Diener, E., S. Oishi, and R. E. Lucas. 2015. "National Accou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3): 234-245.

Diener, E. and L. Tay. 2015.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human welfare around the world as reflected in the Gallup World Pol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2): 135-149.

Easterlin, R. A. and L. Angelescu. 2009. "Happiness and Growth the World Over: Time Series Evidence on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06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69806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Easterlin, R. A., L. Angelescu, and J. S. Zweig. 2011. "The Impact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on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ld Development* 39(12): 2187-2198.

Easterlin, R. A., L. A. McVey, M. Switek, O. Sawangfa, and J. S. Zweig. 2010. "The Happiness -- 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52): 22463-22468.

Fahey, T. and E. Smyth. 2004. "Do Subjective Indicators Measure Welfare? Evidence From 33 European Societies." *European Societies* 6(1): 5-27.

Frank, R. H. 2014. *The Vicious Circle of Income Inequality*.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Gundelach, P. and S. Kreiner. 2004.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dvanced European Countri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8(4): 359-386.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6. "Why Income Inequality Makes Entire Countries Sadder." <https://hbr.org/video/4772103337001/why-income-inequality-makes-entire-countries-sadder> (Date visited: January 14, 2016)

Helliwell, J. F. and H. Huang. 2014. "New Measures of the Costs of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e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3.3 Million Americans." *Economic Inquiry* 52(4): 1485-1502.

Helliwell, J. F. and R. D.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1449): 1435-1446.

Helliwell, J. F., H. Huang, and S. Wang. 2015. "The Geography of World Happiness." Pp. 12-41 in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 edited by J. Helliwell, R. Layard, and J. Sachs. <http://worldhappiness.repor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4/WHR15.pdf> (Date visited: January 14, 2016).

- Helliwell, J. F., R. Layard, and J. Sachs. 2015. "Setting The Stage." Pp. 2-11 in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 edited by J. Helliwell, R. Layard, and J. Sachs. <http://worldhappiness.repor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5/04/WHR15.pdf> (Date visited: January 14, 2016).
- Hsu, H. C. and W. C. Chang. 2015. "Social Connections and Happiness Among the Elder Population of Taiwan." *Aging & Mental Health* 19(12): 1131-1137.
- Jorm, A. F. and S. M. Ryan. 2014. "Cross-nation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43(2): 330-340.
- Kahneman, D. and A. Deaton. 2010.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38): 16489-16493.
- Kawachi, I., B. P. Kennedy, and R. Glass.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Self-rated Health: a Contextu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9(8): 1187-1193.
- Kozlowski, S. W. and K. J. Klein. (2000). "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s: Contextual, Temporal, and Emergent Processes." Pp. 3-90 in *Multilevel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in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Extensions, and NEw Directions*, edited by K. J. Klein and S. W. J. Kozlowski.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Lawless, N. M. and R. E. Lucas. 2011. "Predictors of Regional Well-Being: A County Level Analysi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1(3): 341-357.
-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2. "Social Capital." http://www.prosperity.com/download_file/view_inline/2837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2014. "The 2014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http://www.li.com/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14-legatum-prosperity-index.pdf?sfvrsn=4>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 Lin, J. P. 2015.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he Effect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Pp. 179-198 in *Successful Aging: Asian Perspectives*, edited by S. T. Cheng, I. Chi, H. H. Fung, L. W. Li, and J. Woo. New York: Springer.
- Lin, N. 2008.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Pp. 50-69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 edited by D. Castiglione, J. W. van Deth, and G. Wolle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M. Woelfel, and M. Y. Dumin. 1986. "Gender of the Confidant and Depression." Pp. 283-306 in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edited by N. Lin, A. Dean, and W. M. Ense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nd, N. 2014. "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Pp. 3529-3530 in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Springer*, edited by A. C. Michalos.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Lucas, R. E. and C. L. Gohm. 2000.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3(2): 91-317.
- Lucas, R. E. and M. B. Donnellan. 2012. "Estim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Single-Item Life Satisfaction Measures: Results from Four National Panel Stud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5(3): 323-331.
- Luechinger, S., S. Meier, and A. Stutzer. 2010. "Why Does Unemployment Hurt the Employed? Evidence from the Life Satisfaction Ga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5(4): 998-1045.
- Michalos, A. C. 2017.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MDT)." Pp. 39-95

in *Development of Quality of Life Theory and Its Instrument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Oishi, S. 2010. "Culture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ishi, S., E. F. Diener, R. E. Lucas, and E. M. Suh. 1999.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and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8): 980-990.
- Okulicz-Kozaryn, A. and J. M. Mazelis. 2016. "More Unequal in Income, More Unequal in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3(3): 953-975.
- Orviska, M., A. Caplanova, and J. Hudson. 2014. "The Impact of Democracy on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5(1): 493-508.
- Oswald, A. 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107(445): 1815-1831.
- Portela, M., I. Neira, and M. del Mar Salinas-Jiménez. 2013.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urope: A New Approach 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4(2): 493-511.
- Portes, A. 2000.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Pp. 43-67 in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E. L. Lesser. Woburn, MA: Butterworth.
- Putnam, R.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Rodríguez-Pose, A. and V. von Berlepsch. 2014. "Social Capital and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Europ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2): 357-386.
- Rözer, J. and G. Kraaykamp. 2013.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3(3): 1009-1023.

Sachs, J. D. 2015. “Investing In Social Capital.” *World Happiness Report* 152-158.

Sampson, R. J., S. W. Raudenbush, and F.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5328): 918-924.

Smith, T. W. 1992.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4(3): 275-280.

Steptoe, A., A. Deaton, and A. A. Stone. 2015. “Subjective Wellbeing, Health, and Ageing.” *The Lancet* 385(9968): 640-648.

Stevenson, B. and J. Wolfers.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282. <http://www.nber.org/papers/w14282>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Sutin, A. R., A. Terracciano, Y. Milaneschi, Y. An, L. Ferrucci, and A. B. Zonderman. 2013. “The Effect of Birth Cohort on Well-Being .The Legacy of Economic Hard Tim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379-385.

Swift, H. J., C. M. Vauclair, D. Abrams, C. Bratt, S. Marques, and M. L. Lima. 2014. “Revisiting the Paradox of Well-Being: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Context.”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9(6): 920-929.

Teese, R., S. Lamb, M. Duru-Bellat, and S. Helme. 2007.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ory and Policy*.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Treas, J., T. van der Lippe, and T. O. C. Tai. 2011. “The Happy Homemaker? Married Women’s Well-Be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90(1): 111-132.

- Vanassche, S., G. Swicegood, and K. Matthijs. 2013. "Marriage and Children as a Key to Happines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tatus and Children on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2): 501-524.
- Verme, P. 2011.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7(1): 111-137.
- White, M. P., I. Alcock, B. W. Wheeler, and M. H. Depledge. 2013. "Would you be Happier Living in a Greener Urban area? A Fixed-Effects Analysis of Panel dat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6): 920-928.
- Wilkinson, R. G. and K. E. Pickett.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 Woltman, H., A. Feldstain, J. C. MacKay, and M. Rocchi.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utorials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Psychology* 8(1): 52-69.
- World Bank. 201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5a. "GINI index."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 World Bank. 2015b. "Life expectancy."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 York, R. and S. E. Bell. 2014.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Nations: The Effects of Women's Political Status and Public Prior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8: 48-61.
- Zaidi, A., K. Gasior, M. Hofmarcher, O. Lelkes, B. Marin, R. Rodrigues, et al. 2013. "Active Ageing Index 2012: Concept, Methodology and Final Results." Active Ageing Index (AAI) Project: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Grant No: ECE/GC/2012/003. http://www.eurocentre.org/data/1453740620_84975.pdf. (Date visited: November 20, 2015).

Social Capital and Happines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cross Three Generation Groups

You-Hui Wang* Hui-Ching Weng**

Abstract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is an important index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happiness and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data. Three data sources are used. Samples are take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ISSP) across 30 countries, providing a total of 49,504 people who are divided into three age groups: the young (20-34 years old), the middle-aged (35-64 years old), and the elderly (over 65 years old). This study us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o measure the cross-level effects of happiness from different age groups (you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in 30 countries.

The results find (1) of the 30 countri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happiness level of the three age groups in 25 of these countries. The score of the elderly's happiness is shown to be the lowest out of the three age groups in 20 of the countries. (2) The elderly's happiness is affected the most by country factors, about 14% in the three age groups. (3) National level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lderly's happiness. (4)

* Graduate Student,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u19920913@gmail.com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hc6127@mail.ncku.edu.tw

Received: May 25, 2016 ; accepted: December 5, 2016.

Social capital acts as a buffer agains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educational degree on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happiness, social capital,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the elderly